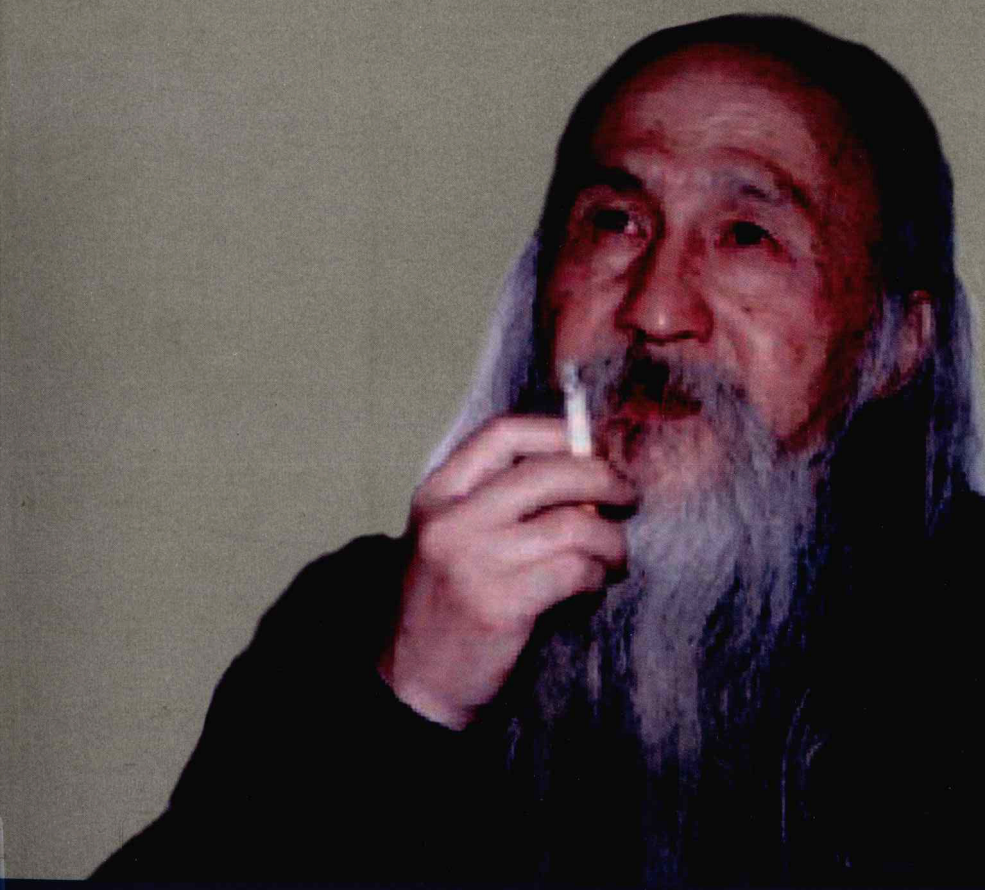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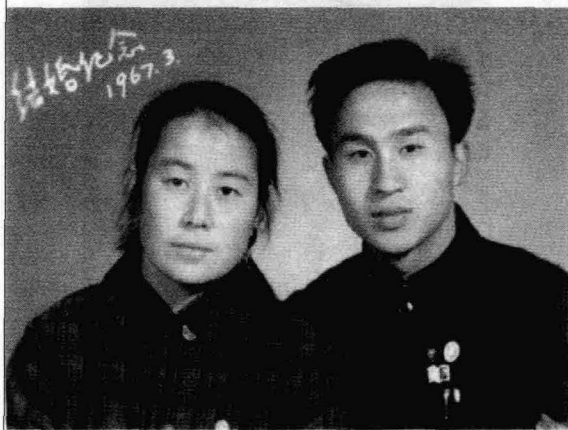


李贵仁文集

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



李贵仁 1965 年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李贵仁 1967 年 3 月和樊云英结婚



李贵仁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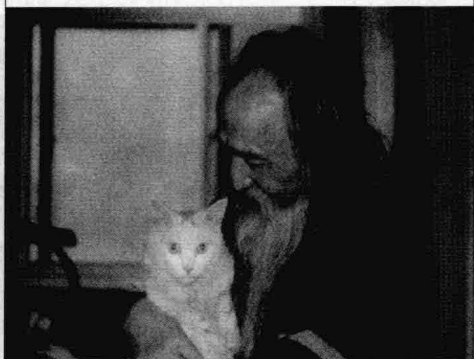
李贵仁 1987 年主持华岳文艺出版社成立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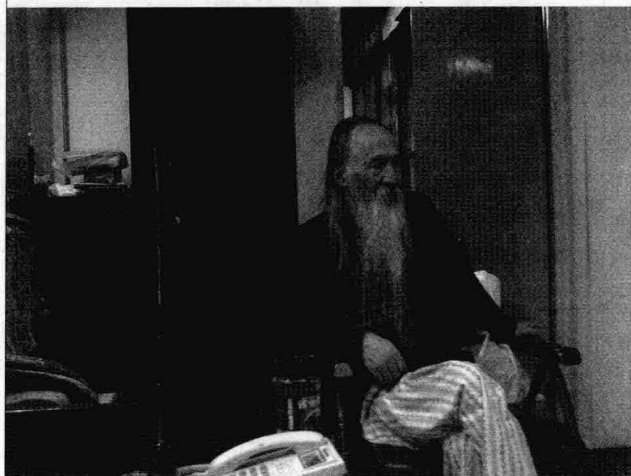
1994年初，二次入狱前与 妻儿合影



李贵仁 1994年6月出狱回家后



李贵仁和小猫豆豆日夜相伴. 2002 年 9 月



李贵仁 2004 年 8 月在家中，时年 60 岁

弁 言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我服膺了几十年，在渐入老境时却禁不住怀疑起来。且不说古代文章能流传的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也不说当代芸芸众生为了各种目的而炮制的无数文章转瞬即被当作垃圾扫荡，单是屡屡发现时下红得发紫的某些大作家和大学者的绝大多数文章也迅速进了废品收购站或垃圾堆，就够使人丧气的了。我常常为这些动辄宣称自己著作等身、得过许多大奖、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和大学者难过，甚至替他们脸红，而在哀叹他们那些曾被包装得令人眩目的文章所遭遇的命运时，我则感到恐惧，竟像自己受了羞辱失了魂魄或从山巅坠入万丈深渊似的。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多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文章不出书，我总是以反问代回答：“写了文章出了书，又能怎样？”

与此同时，我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文人。我是从不把自己看作什么特殊人物的，更不同意别人给我加上这样那样的称号；

在很长时间里，我只承认自己是个文人。后来，我就连文人这个标签也不要了。我着实把自己等同于叫化子或捡破烂的。过去我就认为自己决不比总统总理总书记主席部长省市长大人物低，但也决不比叫化子或捡破烂的高，现在更这样看。本来就是个最普通的人，那就和最普通的人一样，活一天算一天，悄无声息地等待寂灭——从尘土归于尘土。我甚至想好了，一旦无法再活下去，就毫不犹豫地自行了断。

然而，我终究不是悟彻之人；或者说，我终究未能脱俗。写文章和出书的欲望，仍在我心底潜伏着。十多年来，我之所以没写什么文章，固然是因为人间充斥的文字垃圾已经多得令人窒息却还在不断被无数人以更快的速率成倍制造，我生怕自己写的东西也被混入文字垃圾唾弃，所以干脆不写，但事实上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原因：先是遭牢狱之灾，继而缠绵病榻，稍有起色又为生计所苦，不得不以病弱之躯日夜拚命给几家出版社校对书稿，赚取千字七八毛钱的微薄报酬糊口，为此耗尽了时间和精力，连读书都困难，遑论写文章！何况十多年来我一直与世隔绝或半隔绝，写文章的源头活水几近堵塞，才思已趋于枯竭，写文章的欲念也就被压到了心底，同埋葬了差不多。我想，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罢。对此，我从无怨悔之意。我认命。但在年近花甲时，我却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恐惧：对人生无意义的恐惧。尽管对所谓人生意义可有多解，尽管从其他方面来看我的人生并不是无意义的，可是曹丕那句话早已融入我的灵魂，再怀疑也无法改变它对我的控制，所以，我给自己规定的人生意义从来就是也从来只是给后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闻达，不求富贵，而惟求此愿得遂，否则，我就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义——其他方面的人生意义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认

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还有许多人的人生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好文章或隐或显、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曲或直地影响、推动和改造着。我坚持认为，前人以他们的好文章起了这种作用，后人理应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这种作用延续下去。这种信念，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从未放弃或改变过，只是因时世之故而在无奈的悲愤中使之被压抑过一段时间罢了。如今，它又抬起了头，并向我敲起了警钟：疏离文章的时间已经太久，倘不赶快回归正道，必将堕入人生无意义的万劫不复之境！这使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我检讨了这些年来自己对曹丕那句话的怀疑。其实，那句话并没有讲错，它所指的本来只是能够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好文章，并不包括充斥人间的文字垃圾。古往今来，文字垃圾永远比好文章多千万倍，可是，它们非但不能从积极方面塑造人生、改造社会，反而对积极地塑造人生、改造社会起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它们在本质上是腐朽的，即便一时间骗取过荣耀，也必然速朽。这当然不会使好文章受到损害，而只会使好文章的巨大威力更加彰显，好文章的生命力也必将更旺盛更强大。此乃不可移易之真理，实在不该忘记。

从另一方面来说，面对满世界的文字垃圾，我又何必恐惧？只要自己不是文字垃圾制造者就行了。好文章是不能混同于文字垃圾的，也决不会变成文字垃圾。我敢说，我在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之后所写的为数不算多的文章，可能被历史湮灭，却永远不会沦为文字垃圾。在这一点上，我比某些大作家和大学者

更有理由自信。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坦然地写下去，在有生之年克服重重困难，再写些好文章。

然而不可改变的是，好年华已被耗尽，我的人生恐怕离尽头不远了，在贫病交加中，再努力也未必能写出多少令自己满意的文章。

因此，我决定在还能动手时，赶快先把旧作整理出来，以防不测。这些旧作经时间磨洗后，至少有三五篇是留到后世也会有价值的，我不忍心让它们白白消亡而使自己愧对今生。

二

这部文学理论和批评专集，本来选了我于1978至1988年间所写的部分文章，曾于1989年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已改至二校，且已征得上万册订数。未几，“六四”惨案爆发，我因在此前后临街张贴致赵紫阳的三封电报和要求罢免李鹏等人的大标语、多次组织陕西省新闻出版和文化艺术界大游行、在广场发表演说、策划罢工、撰写讨邓檄文而被定为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陕西省第一号政治犯锒铛入狱，此书遂在将面世时胎死腹中。幸而原稿及校样被亲友（主要是三弟茂信一家及原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科郁金娣女士和西安新华印刷厂的干部、工人）保存下来，未在警方抄办公室和抄家时丢失，令我于悲愤中感到欣慰。

选入此书的文章，尽管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和《文学论集》、《新文学论丛》、《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华人世界》、《社会科学》、《当

代文艺思潮》、《人文杂志》、《文学家》、《小说评论》、《延河》、《草原》以及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等报刊上发表过，却有不少在结集之前就已遭过厄运，足见我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之人。

我自己很看重，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严文井、萧乾、毛承志、杨桂欣等先生也很看重（毛、杨二君选中并编发）的两篇文章——《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泛论〈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论〈飞天〉，兼驳燕翰》，本已决定在大型季刊《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和第3期上发表，却因邓大人突然改“放”为“收”而同时遭殃：前者刚印好，被勒令从刊物上撕掉，只有几百份悄悄从内部流入社会；后者已排出清样，也不由分说撤了下来。不过后者的命运稍好：五年后，它又被中国作家协会选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只可惜被删掉了一些重要段落，且有许多排印错误。

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于1982年写出后，尽管政治形势不允许，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仍决定迅即发表，然而也是刚排出清样就顶不住高压，被迫放弃。1985年春，此文由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杂志发表，同时在西安由我主持的《文学家》杂志发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出版局极为震怒，不仅下令查禁这一期《文学家》，销毁了10万册中的4万多册（有5万多册已被书店和邮局抢先发出），而且免掉了我在《文学家》的领导职务。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等人，还多次追究和点名批判我这篇文章。幸亏当时由朱厚泽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知此文在社会上特别是高校中影响很大，却不愿干

预，而当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陕西省文化厅厅长的著名作家李若冰先生又对我加以保护，在邓力群严令查处之后仍力主以学术问题对待，我才未罹大祸。（此文名为硕士学位论文，我却恰恰因为此文而未拿到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在1982年和几年之后两度提出，只要换一篇现成的论文参加答辩就马上给我学位，而我的回答总是宁可放弃学位也不更换论文，并提出了校方决不肯接受的三个条件：答辩委员会由周扬、王若水等人组成；答辩在大礼堂举行以便让更多的人旁听；答辩时允许记者采访。）

《历史无情 历史有情——为刘宾雁〈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代序》曾于1988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办的《华人世界》杂志决定发表，但送审没有通过，排出清样后撤掉；不久，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延河》月刊又拟发表，也排出了清样，但是陕西省委宣传部连下三道禁令，逼着编辑部把它撤了下来。那本载有此序的刘宾雁报告文学集，则在由我担任副总编辑的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遭禁，原因也正是有我这篇序言。我不服，先后同省出版局党组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闹翻，旋即把官司打到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在中宣部有关人士和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先生等人支持下，竟然赢了，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只好在电话中对我表示省委不再干预此事。但很快就响起了枪炮声，赢家遂惨遭镇压。我入狱后，这篇序言连同刘宾雁这本书，12万册有一半化为纸浆（另一半已在此前由书商们抢发到全国各地）。《陕西日报》为此专门发了加花边的消息，竟将其列为“扫黄”战斗的成果。张勃兴还在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把我写这篇序、出这本书和我同刘宾雁的亲密关系统列为我的“重大罪状”之一妄加诋毁。

我为马德波《电影艺术纵横论》作的序，为《阎纲短评集》作的序，也都在我身陷囹圄之后遭到扼杀。前者还连累马德波那本书未能发行，并且和我为刘宾雁写的代序一起，被化名“谷音”的御用文人（此人后来升为副厅级大官）说成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白”，同所谓 1989 年的“血的教训”联系起来，在《陕西日报》上以显赫的篇幅点名批判。

命运也会有多重性。我的许多文章不见容于当局，却仍能通过多种途径走红，颇有几篇是报刊争相转载人们争相传阅的，还有被列入《中国百科年鉴》和其他年鉴或被选入某些文集和资料汇编的。《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在国内遭禁后，不仅仍有资料性的刊物转载，还有国家档案库性质的刊物从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上复印回来。载有此文的《文学家》杂志和载有我的代序的刘宾雁那本报告文学集，劫后余生的部分，据说有些书商至今还私藏了不少，偷偷地向求购者卖高价。前不久，又有几位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从本市和外省打电话告知，他们在因特网上读到了美国的网站或网络图书馆所收录的我的某些文章，其中有些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特别使我感到意外和不能忘怀的是，1989 至 1994 年间先后关押我的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陕西省第一监狱（在富平县）和陕西省第二监狱（在渭南市），都有我的某些文章早已在监管人员和犯人中流传，因此在我被送进去之后，有不少监管人员和犯人竟奔走相告，纷纷设法到我的牢房看望，并对我加以照顾。当然，后来我被单独监禁，还有专人日夜监视，休说犯人，就连一般监管人员也不准接近我了。

三

我本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只写出了很少一部分，能让自己满意的更是屈指可数。十多年前编这本集子时，我痛下决心淘汰了几篇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大块文章，原因正是我自己不满意——尽管它们也有一定价值而绝非文字垃圾。但这并不意味着编入集子的文章就一定是我满意的。有好几篇只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才编进来。如今重新整理，我又删掉了几篇，而仍予保留的也未必都令我满意。

在编成此集后的十多年里，或一年写几篇，或一年只写一篇，甚或几年才写一篇，所得文章自然不足以另凑一集。为了不使自己遗憾，姑先取其中若干纳入本集存世。

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绝大部分未经删改，只有少数几篇遭过斧削或排印错谬甚多，编入本集时皆恢复本来面目。惟《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北京文艺》发表前由当时的主编李清泉老先生精心修改过，为表示对这位可敬的老前辈的尊重和感谢，没有改回原貌。

十多年前写的自序和后记，均予保留。

2003年2月28日晨6时竣于西安

3月6日晨5时改定

遥望星空

(一部未来著作的序言之一)

遥望星空，永恒的困惑。

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万能的科学家们早已准备好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问题的完美解释，那是很能安慰人也很能鼓舞人的。自少年时代起，我能走出蒙昧，正是仰仗了他们建树的这种功业。所以，尽管我是个生性顽劣的家伙，四五岁时就在学堂里同先生对抗，直到小学毕业还割据一方，统率一群孩子到处打群架，以征服为乐事，我却终究没去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而在实质上成了个自觉自愿的被征服者——匍匐于万能的科学家们脚下的被征服者。年复一年，我在日渐扩大的范围内心悦诚服地不断接受他们的征服，也就是说，不断接受他们灌输的各种理论，用以充塞和武装自己的头脑。比如，我接受了日心说，虔诚地坚信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又带着月球围绕太阳转。我认为，这肯定是绝对真理。然而，冥想和思索，再加上怀疑，不幸就出现了。由此势必陷入无可解脱的最深沉的悲

哀，到极点时，头脑就会爆裂，被莫名的痛苦挤压得爆裂。没有人知道我曾多少次坠入这个深渊。

恰恰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在我成为万能的科学家们征服的对象之后不久，我遥望星空，冥想和思索起来，由不得也就产生了怀疑。那浩瀚的星空有多大呢？它有边吗？如果无边，究竟是因为什么？无边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有边，那么边际之外又是什么？我钻进这个牛角尖，怎么也拔不出来。于是头脑发胀，胀得想去撞死。

为了摆脱困境，我狂乱地搜索枯肠，却硬是记不起征服我的科学家们有谁曾解释过这个难题。这决不能怪罪于我的学识简陋。事实上，我在进一步思索之后毫不犹豫地断定，谁也不可能对这个难题作出解释，在它面前，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只能耸耸肩，暴露出绝对低能的本质。

当然，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就全盘否定科学家们，甚至在很长时间里丝毫没有动摇对他们的信赖和尊崇；我只是开始懂得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万能的人，大智大慧的科学家们也无法成为万能者。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宇宙本身有许多谜，绝非人类所能猜破。这是一些可怕的谜，致命的谜。谁如果不自量，硬要去猜，他只能自蹈灭顶之灾。布鲁诺在十六世纪被判火刑活活烧死；到了二十世纪，则有更多的人遭到枪杀。这些冤死鬼的厄运，岂不是都源于他们太不自量、太狂妄吗？

就我的品质而论，显然也有浓厚的狂妄色彩。一位很熟悉的女友曾把我称为“狂狷之士”。但我决没有狂到不自量的地步。我从未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过坦克(谢天谢地，我至今没有机会遭遇这种钢铁猛兽)。对那些致命的宇宙之谜，我也从未

产生过猜破它们的野心。我只是太喜欢遥望星空，太喜欢冥想和思索，并且在冥想和思索中孕育出怀疑这个恶魔，因而难免不由自主地一次次跌进宇宙之谜的油锅中去备受煎熬。

幸而我还明智，初涉险境便学会了逃避的高招，所以每当头脑发胀之际，便果断刹车，赶快把思路转向别处。随着年岁渐长，我还学会了自嘲和自我批判，硬把自己在劣根性驱使下不断旧病复发沉入对宇宙之谜的冥想斥为杞人忧天，以此求取安全。

巨料事与愿违，后来我偏又陷进了更深的危机。事情和我至今还信奉的主义有关。这个主义，尽管有许多人从不信奉，还有许多人信奉过又抛弃了，却总是有人宣称它绝对万能。和我一样信奉这个主义的科学家们，正是在这个主义的鼓舞下，充满豪气，磨炼出了绝对自负的坚强性格。他们消灭了康德。他们粉碎了不可知论。他们在我读中学时，也正是以这种姿态进一步教导我，让我明确了一个精妙得无懈可击的定义：什么是宇宙？宇宙就是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我仿佛升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又一次被科学家们征服了，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能不承认，对宇宙的解释，这是最聪明的，决不可能找出更好的定义来代替它。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继续遥望星空，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冥想和思索，我依然只能陷于困惑。科学家们给宇宙下的定义，确实精妙无比，但是面对我的难题，它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它本身就无法解释。什么叫作无限？（这里有一个蒙太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景，亿万激情膨胀的人民群众跟着林彪挥动红宝书振臂高呼：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谁怀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就枪毙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切入：毛主

席死了，躺在纪念堂的水晶棺里，他没有活到万万岁，只活了八十三岁；他被认定犯了不少错误，不能无限忠于他的一切，只能忠于他的正确部分，所谓“忠于”从“无限”变成了“有限”。切出。终。回归正题——)无限的时间，这还不怎么让我伤脑筋；无限的空间，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太阳系，银河系，无数个星系。为什么是无数个？总该有个数吧？没有数就不成其为世界，不成其为宇宙。然而，一旦数到尽头，再往前走又是什么？不，我想不通，永远想不通。啊，康德不能消灭。不可知论不能粉碎。科学家们面无血色了。我呢，只剩下一条路：用铁锤击碎头脑。

被消灭的康德提出过四组二律背反。我喜欢推而广之，在宇宙间不断发现许许多多二律背反。但我最看重的二律背反只有一组：宇宙空间不能有限；宇宙空间不能无限。

也许应该把这二律背反算作我头脑的产物(实际上，它恰恰是康德提出的第一组二律背反，不过它在我头脑中出现时，我并没有想到康德，而在我作为一个少年遥望星空对宇宙的有限和无限都感到不能接受时，我还根本不知道康德其人及其学说)。也许正因为如此，只有对我来说它才是致命的(据我估计，康德不会像我那样钻牛角尖，所以不至于像我那样悲哀得要死，因为他曾宣称宇宙空间的有限和无限都能得到证明，我则认为都无法证明，这意味着我和康德只不过貌似同道罢了，实质上却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也许我这思绪纯属虚妄。

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思绪？就是因为我有头脑吗？可是凡人皆有头脑，何以独我如此？也许我的头脑有某种先天性的毛病？说到底，是我自己把自己推进了永恒的困惑，推进